

关于金融创新的几个问题

蒋定之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金融创新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果因为“创新”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就怀疑、否定甚至害怕、抵制创新，那就无异于因噎废食；反过来，如果无视历史的经验教训，置创新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原则于不顾，把创新的目的全部放在追逐利润、规避监管上，不能有效地规避和控制风险，这样的金融“创新”必将成为脱缰的野马，最终导致金融泡沫、危机和灾难。由此可见，端正金融创新的指导思想至关重要。就我国而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需要大力推动金融创新；大力推动金融创新，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吸取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更加科学、合理、审慎的态度、理念和模式。为此，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几个问题。

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力

任何一项金融创新，归根结底都是由市场主体来实现的。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实践探索背后，必定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没有市场主体，创新就搞不起来，既出不了成果，也持续不下去。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步确立，创新活动渐趋活跃。但实事求是地看，我国还是一个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的国家，特别是由于我国银行业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脱胎而来的，行政色彩比较浓厚，市场化程度还不是很高。这一现实带来的重要是：首先，创新的主动性不够强。创新更多依赖行政推动，是“要我创新”而不是“我要创新”。其次，面向市场和客户的意识不够强。讲“我有什么”多、讲“你要什么”少，讲“因我而变”多、讲“因你而变”少。面对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却没有多样化。这也是当前中小企业、“三农”等领域金融服务跟不上发展需要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风险承受力不够强。“宁愿不创新、少创新，也不能有风险、担风险”的观念还比较普遍，在应该和可以进行创新的时候不敢迈步子。这些情况表明，促进金融创新的开展，首先需要作为市场主体的银行增强创新的内在动力。真正的市场主体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涌现出一些新的流派和思潮，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等。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当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本质，理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应从解决生态问题入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这一思潮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绿色运动，其主要目标是 为资本主义国家寻求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与生态环境有限的承受能力之间存在的尖锐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一矛盾将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期望的破灭，并由此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它主张建立一种全新的、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由生态原则、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和非暴力运动原则组成的基本理论；要求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实行自主的、创造性的交往；反对利己主义，强调集体利益；反对核军备竞赛，提倡人类和平；等等。从一定角度看，生态社会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比较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

市场社会主义提出通过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它是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遭受挫折、西方世界的凯恩斯主义也失灵的情况下，由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规律。也就是说，市场社会主义具有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这一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但又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市场社会主义还主张根据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系统总结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教训，将市场经济的自由和效率与社会主义的人道和均等结合起来。然而，市场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只是坚持外部结合论，仅仅设

当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述评

王乐平

想在实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改变原来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并没有自觉地去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公有制。

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强调从新科技革命的角度研究社会主义的新变化。这种思潮的产生，主要源于当代西方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启发和影响。其基本观点是：新科技革命使世界由工业社会时代向后工业社会时代过渡，这一过渡带来了社会发展的质变；工业社会时代产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都已经发展到各自的极限，两者将被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制度所取代，这种新型社会制度就是与工业化没有联系的、以后工业社会思维重新塑造的新型社会主义模式；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归宿，在后工业社会，人类将不再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是非常注重人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应该说，这种思潮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影响和意义。

后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一些探索。后社会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意味着历史已经进入后社会主义时代。后社会主义对各国未来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理论主张。其主要观点是：以往的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教条化的社会主义，而后社会主义则是相对成熟的、符合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国情的，以社会发展、公平、效率为基本理念的社会主义；国家干预不仅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反而会导致专制主义；社会主义的实现，不需要进行革命和斗争；等等。

对于当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我们应辩证地、理性地分析。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流派的许多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它们并不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有时还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无法担负起推动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艰巨使命。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社会主义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与反思，对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的一些观点和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的则是关心创新可能给整个体系造成的影响。应当说，创新和监管的博弈不可避免，但这种博弈不是以胜负为结局，而是以一种平衡状态为目标。这种博弈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对银行创新理念的引导，提高对创新风险的识别、计量、预警和防控能力，努力使监管活动紧跟创新实践、紧贴创新实践。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警示我们，任何脱离监管约束的创新，都有可能造成风险失控。应通过科学有效的日常监管，把金融创新作为金融发展原动力的效应发挥到最大，把金融创新诱发和放大风险的可能控制在最小。

金融创新的能力建设

近年来，随着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我们从国际先进银行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金融创新中引进的成分还比较多，原创的成分还比较少；移植和克隆式的“拿来主义”还比较突出，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环节还比较薄弱。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揭示了“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道理。不从国情出发的盲目引进，不经再创新的简单复制，无异于“牛腿安在马肚子下”，水土不服是必然的结果。现在，一些银行模仿国外的做法，创建“私人银行”，但由于没有在产品 设计、市场营销、客户开发等方面进行结合实际的改造，最终把装修豪华的“私人银行”搞成了类似证券公司的“大客户室”，“私人银行”的功能并没有真正实现。引进的真谛是要“神似”，在于学习成功的经验而不在于复制具体的产品和服务。掌握了诀窍，学到了真经，创新实践才可能生机勃勃。因此，要特别重视对世情、国情、民情、行情的分析研究，从实际出发，对引进的创新成果进行深度改造。任何简化和省略消化吸收环节的引进，都是没有希望和出路的。同时要特别重视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原创新型”金融创新的比例，走合理引进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金融创新之路。

金融创新的文化建设

创新文化孕育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催生创新实践，创新实践收获创新成果。从这个角度看，创新文化更带有根本性，有什么样

的创新文化，就会开出什么样的创新之花，结出什么样的创新之果。当前我国银行业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创新的“硬件”建设比较重视，而对创新的“软件”建设重视不够。一方面，下大力气设立金融创新部门，配备专业技术人才，购置先进技术装备；而另一方面，思想、理念、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工作则没有及时跟上去。创新文化建设是一项很难立竿见影的长期工作，但又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关键工作。因此，要把创新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加以推进。应研究制定创新规划，真正把创新作为从根本上提升银行竞争力的重大战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切实做好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使用和储备工作；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允许失误、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为创新活动提供宽松环境。

金融创新的制度保障

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活动不够持续和有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还没有建立起一整套健全、稳定的制度体系，金融创新还处于零散、偶发和断断续续的状态。可以说，银行金融创新的能力在本质上就是制度建设的能力。检验和衡量金融创新能力的强与弱，很大程度上是看银行有没有一套先进管用的制度体系，以及通过这种制度体系调动、集中和配置各种资源，促进创新实践开展的能力。银行内部必须从公司治理、业务流程、激励约束、内控制度、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努力使金融创新成为“条线清晰、流程严谨、权责明确、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障下的可持续行为。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金融创新活动的研究，认识创新规律，把握创新趋势，引导和规范创新秩序，制定对重大金融创新业务和产品的动态管理标准，建立关于金融创新的风险监管、交易咨询、共享推广的长效机制。同时，要通过金融、法律、财税、文化等多部门、多方位的通力合作，努力形成更广义上的鼓励、支持和规范金融创新的合力，共同为银行业金融创新提供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进我国的金融创新，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效、更高水平的金融支持和保障。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同比增长均超过20%



学术

人民网people
www.people.com.cn

本版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人民网理论频道

电子信箱: lilunbu@peopledaily.com.cn

“中国第六届太行山新闻论坛”提出——

积极宣传和自觉践行西柏坡精神

王长宗 郝斌生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采写编》杂志社主办的“中国第六届太行山新闻论坛”最近在河北省平山县举行。这次论坛的主题是“西柏坡精神与当代传媒”。与会者围绕西柏坡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意义、当前我国新闻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与会者认为，西柏坡精神是推动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不仅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推动我国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60多年来，新闻战线在西柏坡精神的激励下，广泛报道国内外各个方面的新闻事

件，大力宣传各项重大成就、成功经验、科学实践，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承和发扬西柏坡精神，对于我国新闻战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创新图强，打造现代主流媒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会者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新闻工作者应进一步弘扬西柏坡精神，不仅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创新新闻宣传的内容和形式，做西柏坡精神的大力宣传者；而且要认真学习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谦虚谨慎、求真务实的敬业精神，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忠实记录时代变迁，做西柏坡精神的自觉践行者。

“学”，是一个纵贯古今的重要概念。《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论语》的其他章节中，论及“学”的语句也比比皆是，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则不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等等。后世的许多文人士学士，对于向学、治学的问题也做了大量论述。尽管如此，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对“学”的理解比较表面化、片面化，颇有深化和“纠偏”的必要。

一般而言，想要对“学”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须解决三个问题：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相对简单：学习是人们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在社会中立足进而有所作为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当代时代，学习更成为一种贯穿终身的现实需要。一个人如果不及时学习、不更新知识，很快就会落伍甚至无法生存。

关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无论古今中外，都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为了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不妨回溯到“轴心时期”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那里，梳理一下这位古希腊哲人的相关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希腊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有五种：技艺、科学、明智(或译为实践智慧)、智慧和努斯(或译为直觉理性)。努斯和科学都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起因不变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前者探求事物的起因和前提，后者则从起因出发、通过推理而得出结论。智慧是努斯和科学的结合，是居于首位的科学即哲学。技艺和明智(实践智慧)都以可变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其中技艺与制作活动相关，指导人们加工、改造那些可以变化的器物；明智(实践智慧)则与实践活动相关，指导人们进行理财、立法、伦理和政治等实践活动。结合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论述和今天的现实生活可以看出，人们需要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相对固定或约定俗成的知识与技能，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中的原理、公设，人类语言文字的基本构造、用法和规范，仪器、仪表等的操作规则，等等；另一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个人兴趣、爱好、禀赋等区别对待与灵活运用能力，如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品的研发与销售、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欣赏、社会组织的管理、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这两类不同的学习内容所对应的学习方法也不尽相同：对于前者而言，主要强调模仿、记忆的方法来学习；对于后者而言，则应更注重领悟、想象、创造，应变甚至批判力的培养。如果说前者体现的主要是规则、规范层面的要求，那么后者则体现了道术、权变层面的要求，而后一种要求更高、更难达到。诚如《论语》中所言：“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然而，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混淆上述两类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的现象还时有所见：一些教育者忽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性质和学习要求，在后者的教学中片面强调一致性，追求所谓“标准答案”；与此相适应，一些受教育者也通过模仿、记忆的方法来学习，本应通过技艺和实践智慧来把握的内容。这样一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个性、创新能力、应变能力等都受到了抑制和削弱，从而出现了学与用、知识与能力的脱节。由此可见，深入、全面地理解“学”的内涵和要求，正确掌握和运用相应的学习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学术随笔

“第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强调——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江 洋

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的“第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最近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60 年(1949—2009)”这一主题，梳理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与伟大成就，探讨了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

与会者认为，新中国 60 年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与发展过程，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的过程。60 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党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同时，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营养和动力，并形成了新的理论形态，即当代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

与会者表示，新中国 6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带入了新的阶段。在新形势下，广大理论工作者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继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探索并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同时，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针对干部群众的关切，析事明理、解疑释惑，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第一届中国越马克思主义论坛”认为——

中越发展成就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郑一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越马克思主义论坛暨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双边研讨会”最近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和越南革新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到与其他各个领域；都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起来；都把对外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在向现代化前进的过程中，两国也都遇

到了类似的问题。深刻总结两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吸收和借鉴彼此的发展经验，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越南的革新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者提出，中越两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和越南革新以来，两国都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在新的形势下，两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改革开放(革新)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学术信息